



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

谭培文 著

MAKESIZHUYI WENBEN YU XIANSHI DE DUIHUA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文本与 现实的对话

谭培文 著

MAKESIZHUYI WENBEN YU XIANSHI DE DUIHUA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谭培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
ISBN 978-7-01-019148-5

I. ①马… II. ①谭… III.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5484 号

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

MAKESIZHUYI WENBEN YU XIANSHI DE DUIHUA

谭培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4

字数:52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9148-5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作者简介

谭培文，男，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西特聘专家，师从南京大学哲学系孙伯鍨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点一级学科带头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多项。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伦理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67 篇；出版学术专著 11 部，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与高教出版社等出版的教材 3 部。论著获广西（省）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4 项。专著《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2006 年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教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获广西（省）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7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目 录

文本乃治学之本 现实为创新之源——纪念和弘扬孙伯鍨先生的 学术精神(代绪)	1
第一章 文本的逻辑起点: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	5
第一节 真理标准与道德标准的关系	5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道德话语权批判	16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探索	27
第四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人道化道路哲学审视	35
第五节 恩格斯关于恶的辩证分析	39
第六节 新自由主义理论传统价值取向	49
第七节 “唯一者”与马克思的个性观	59
第八节 现实的个人: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	66
第九节 马克思论人的科学方法研究	76
第十节 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哲学基础	91
第十一节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批判	103
第二章 文本走向现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	11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	113
第二节 建国 60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根据	12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138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	146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的价值因素	160
第六节 发展与代价二难悖论的哲学沉思	171

2 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

第七节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	175
第八节 世界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87
第九节 发展风险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197
第三章 文本与现实的中介: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	205
第一节 利益范畴的历史嬗变与现实解读	205
第二节 利益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	213
第三节 利益是走出唯心史观魔谷的阿莉阿德尼之线	225
第四节 物化观与马克思问题域逻辑转换	235
第五节 人类的利益是发展生产力	247
第六节 马克思利益观与中国传统观念	257
第七节 孔扬墨利益观的现代阐释	268
第八节 邓小平的利益观	280
第九节 和谐社会利益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291
第十节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利益机制选择	303
第四章 文本与现实的疑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318
第一节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主题研究	318
第二节 语言生态环境视野的文化软实力	335
第三节 列宁语言生态思想	344
第四节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意识形态理论	358
第五节 当代大学生信仰与信仰教育研究	367
第六节 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权建设	379
第五章 文本与现实相统一的终极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389
第一节 人的全面发展理想与现实的二难解读	389
第二节 日常生活世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平台	399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的价值导向	408
第四节 以人为本阐发的几种关系反思	417
第五节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当代价值	429
第六节 从底线伦理到终极价值的转换和实现	441
第七节 中西自由方法论比较	454

第八节 社会主义自由的张力与限制	465
第九节 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认同的辩证分析	494
第十节 改善民生与核心价值认同	504
第十一节 论世纪之交的实践向度	513
参考文献	526
后 记	531

文本乃治学之本 现实为创新之源

——纪念和弘扬孙伯鍈先生的学术精神

代 绪

师从孙伯鍈先生,是我走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常常值得津津乐道的话题。大凡考生都有这样一种心理,不见导师很神奇,见了导师又平常。考博以前,经常看到他的著作和论文,经常有人谈论南京大学的孙伯鍈先生,从而下定了追随孙先生的决心。然而,当我成为孙先生博士生以后,从外表来看孙先生,孙先生同样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孙先生简朴明快,敏于事而慎于行,待人勤恳,和蔼可亲,十分平常。那么,跟随孙先生究竟学些什么?我又开始有些迷糊了。孙先生学养优良,学识渊博,文本功底深厚,是我所欲也;孙先生思维敏捷,论辩精当,鞭辟入里,是我所欲也;孙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是我所欲也……这些都是基本的,皆为我欲追求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是他的学术精神。

孙先生主要的学术精神是什么?孙先生崇高的学术精神不在他的生活世界之外,其实也就在他的学术生涯的平常之中。从孙先生日常的学术生涯来看,其主要特点是敏于事而慎于行。而在敏于事和慎于行之间,首先是“慎于行”。所谓“慎于行”,对于学人而言,绝不是要像孔子的传道者所说的那样,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儒家礼教中的人。这里的“慎于行”,主要是指孙先生治学方面的严谨,坚持文本为治学之本的原则,强调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这似乎为专家学人的常规之则。但是,在当代要做到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孙先生却是躬身厉行、矢志不渝。在这一方面,孙先生正确地处理好了四个关系,即本与末关系,功与用的关系,述与作的关系和冷与热

的关系。

1. 冷与热的关系

冷与热的关系,如果严格地从学术精神上来看,它应该是四种关系中最末的一种关系。但是联系到孙先生所处的时代,它是当时专家学人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第一种最为重要的关系。20世纪末叶,我国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学术界浮躁之风逐渐加剧。“斯文”做研究不如扫地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做学问注重文本的人越来越少。板凳要坐十年冷似乎已经不合时宜,热的是“下海”捞钱,为评职称而去掏钱发文章,那里还有什么真正的学术研究?孙先生就是不为世态炎凉所动,板凳一坐十年冷,咬定青山(马克思主义文本资料的研究)不放松,永不停息地日日夜夜地研究和探索。他写作的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著作《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也可以说,就是他本人从早年一个人在北京大学从教(当时他的家属在江苏工作),后来(文化革命后)到南京大学工作,数十年坐着冷板凳探索马克思道路的艰苦探索。

2. 本与末的关系

在研究中,什么是本?什么是末?这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学术浮躁的现代,它却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有些人做研究,不看原始资料,只阅读二手资料。还比如,有的人批评马克思,但是马克思的文本并没有真正地认真读过。研究风气竟然如此,孙先生对此十分反感。在当代,由于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复杂原因,在马克思逝世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不同,已经出现许多不同的流派,在国外,有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国内,更是百家争鸣,东西南北各不同。孙先生认为,马克思不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流派,这是正常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不能莫衷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才能比较正确地反映马克思的思想呢?如果马克思还在,马克思自己当然可以出来讲话。然而,“昔人已乘黄鹤去”,马克思早已辞世,那么,从研究马克思的视角来看,就要《走进马克思》(孙伯鍈、张一兵著《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本”,而各个流派的不同观点,只是本之流末而已。

3. 功与用的关系

所谓功与用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孙先生培养博士的思路。孙先生认为,培养博士阅读文本的能力,这是治学之本,也是博士的“功”,而写文章只是这种“功”之“用”而已。20世纪90年代,南京大学对博士开始试行一些新的规定,那就是博士在读期间,必须要在南京大学指定的国家一流期刊上发一篇论文(理科则要求必须有进SCI索引的论文),在省以上的公开刊物上发两篇论文。这一规定对我们的压力真是太大了。当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博士生,三年寒窗含辛茹苦,最后竟与博士学位失之交臂。而在孙先生看来,这只不过是功与用的关系问题,因而,关键还是要读好文本,练好内功。练好了内功,不怕发不了文章。在那样的一个万马齐喑的紧张气氛中,孙先生这一席话,不仅没有缓和我们的紧张气氛,而且还为我们的这种气氛增加了几分紧张。他要求我们,凡硕士不是南京大学读的,除开读好博士要读的文本之外,还要求去听硕士的原著课。追随孙先生,我们整天整天都是读书而已,我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的哲学著作,等等,读书笔记共做了20多本。虽然苦了,但是,到了后来,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进入南京大学之初,有如“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是最初的境界;在孙先生指导下,日复一日地读书和做笔记,练功的过程,正是历经了一个“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练功的过程,这是第二个境界;只有最后才可以说,开始感觉进入了一个“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新的境界。

4. 述与作的关系

“述”的本来含义应是谈话和陈说,我在这里把“述”引申为研究,因为学者的课堂陈说,与本人的研究原本就是一回事。而“作”就是发文章。个人研究和发文章也应是相互统一的,有研究就可以发文章,没研究当然无文章可发。当然,在古代也不乏一些特例。苏格拉底是述而不作。孔子的《论语》,也不是孔子自己发的文章,而是他的学生后来根据其述而作。可是,在当代,这个问题就离谱了一些。没研究的因为有钱,可以拿钱去买版面发文章;有研究的因为没钱,有文章也可能无处可发。在这个问题上,孙先生始终把研究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发文章的多少。在他那里,不成熟的东西他决不会随意拿出来。孙先生有一种只求研究,不求闻达的精神。

所谓“敏于事”，这里的“敏”，是敏感、敏锐的意思；这里的“事”，是现实存在的事物；“敏于事”，是指孙先生关注现实，对现实有所敏锐的洞察力，把现实看作是创新之源的学术精神。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源于时代，哲学又高于时代。哲学是时代的精神，是说哲学源于时代；哲学高于时代是指哲学不是简单地对时代精神的机械地复写，而是对时代精神的概括和总结，也就是对时代精神的再创造，最后，提炼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现实与创新之间，现实是创新之源。孙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既强调“走进马克思”，又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由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孙伯鍈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三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1992 年版），其面目比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如果说有不同的话，那就是它有较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孙先生的学术精神青（此处若用“罄”显然不妥，借“罄”谐音而用之）竹难书，他所倡导的“文本乃治学之本，现实为创新之源”，也未必真正代表他的学术精神。因为，充其量这只能算是我对孙先生的学术精神之拾零而已。尽管孙先生的学术精神，在我国的学术精神宝库中只是一滴小水珠，但是我国的学术精神宝库就是由这些无数的小水珠汇集而成的。一滴水珠，在太阳的照耀下，也照样会发出灿烂的光辉。

《诗经·小雅·车辖》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引《史记·孔子世家》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①

孙伯鍈先生的学术精神永放光芒！

是为序。

谭培文

2017 年 12 月于桂林寓所

^① 该文原载于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编《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之《探索与反思——哲学家孙伯鍈》，张异宾、唐正东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7—221 页。

第一章 文本的逻辑起点: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

第一节 真理标准与道德标准的关系

论真理标准与道德标准的关系及其意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肇始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真理标准在我国已成了深入人心的行为实践原则。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经济实践的负面影响也随之凸现出来。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和道德规范还不到位,道德建设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道德标准也成为当前人们认识、衡量和评价改革开放的成败和制定政策法规与指导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和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理论界有些人却把道德标准当作认识与评价改革开放的标准之标准,以道德标准来批评和否定生产力标准等。这就可能否定改革开放,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究竟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真理标准与道德标准的关系,仍然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真与善的二难悖论

真理标准是检验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是否相符合、相一致的尺度。如果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相一致,其主观认识就为“真”或“是”,否则即为“假”与“非”。而道德标准则不同,道德标准是判断道德主体出于道德原则的道德行为是“善”或“恶”的尺度,道德主体出于责任、良心的道德意志所命定的并取得好的效果的道德行为,一般为“善”和“应当”的有价值的行为,否则

为“恶”和“不应当”。那么,认识的“真”,是否就是道德的“善”,由认识的“是”是否可以推出道德价值的“应当”呢?这个问题,在古代由于受社会发展程度、认识水平的局限,尚处于一种模糊的认识中,并未作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提出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认识论与伦理观基本是一致的,如孔子提出的知行合一论。行为的善恶与认识的真假有一致性,所以儒家认为人的行为可以通过道德约束来规范。法家则不同,如管子也强调知行有一致性,但是对道德的善对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因此他认为,只有法治才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唯一规范。韩非认为,只有严刑苛法才是令行禁止的唯一手段。《韩非子·五蠹》说:“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羊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在古希腊,认识的真与行为的善二者并未尖锐对立起来。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的特殊功能,“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①这里的人的特殊功能,就是指人主动选择理性生活的能力,即道德生活的能力。人类的善就是心灵合乎德行的活动。而快乐主义则不同,快乐主义只追求感性欲求的满足。但无论如何,认识的真理与道德的善始终未绝对对立起来。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所提出的著名的命题,即‘凡实有的事物都是一,是真,是善’”。^②这里的“一”就是指唯一的实体——上帝。上帝是真,是善。在这里,真与善的一致成了上帝的化身。但是,到了近现代情况就不同了,人们把认识的真和道德的善不仅绝对对立起来,而且认为认识的真与道德的善二者完全相悖。如康德就认为,认识的真根本就不是道德的善,道德的善并不在于认识的真。康德出于对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综合,认为在认识论领域,理性离不开经验,主观理性要与经验相符合,因为“真理是知识与其对象的一致”。^③而追求道德的善则不同,道德的善不能在欲望、感性对象中寻找,只有出于真正的善良意志的道德行为才是善的行为。康德批判了功利主义的善的理念。功利主义把善看作是对个人欲望、需要满足的程度。边沁认为:“功利原则指的就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

①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7页。

②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③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以该行为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①凡是满足个人欲望、需要、幸福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则有害。康德认为,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欲望、需要、幸福而做好事,这不是真正的善,比如当一个孩子落水,为了获得奖金,才愿意下水救人。真正的道德,应当是纯粹出自善良意志的行为,即为善而善,如施恩不是为了图报。所谓纯粹,就是“通体透明,丝毫不受利己意图和个人打算的污染”。^②按照康德的理解,在人的感性经验、欲望需要领域没有道德,道德必须脱离感性经验与欲望,道德的善必须在人的纯粹的实践理性、善良意志中寻找。在他看来,在人的现实的感性世界,至善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至善要求道德与幸福一致,有德之人必定有福,有福之人必定有德。但是,行善如果以幸福的感性欲望为目的,德行成为获得幸福欲望的原因,这就不符合德行是为善而善的原则而不是真正的道德。事实是,有德之人未必有福,有福之人未必有德。“至善”在此岸的感性、欲望世界是不可能的,至善只有在超感性的彼岸世界才能实现。

总之,在康德看来,真理标准要求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认识的真要求主观与对象相一致,认识的理性世界不能脱离认识的感性世界;道德标准则要求,实践的道德理性只有超越、脱离感性世界,至善才是可能的。道德的善与认识的真恰恰是完全相悖的。

二、马克思主义论真理标准与道德标准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是符合论,即认为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马克思批判和改造了康德、黑格尔的真理标准观,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③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标准也称为善恶标准,即认为凡是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就是善,反之为恶。它是判断人们行为

①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1—212页。

②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代序》,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138页。

善恶、荣辱的尺度和根据。问题是,真和善是否真的如康德所说是相反相悖的?德与福是否正如熊掌与鱼一样不可兼得?坚持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是否就是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区别与联系做了较为深刻的论述。

首先,真理标准与道德标准是适用两个不同领域的标准,二者有其严格的界限,既不能因为真理标准是道德标准之标准而取消道德标准,更不能用道德标准替代真理标准。

真理标准是指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属于哲学认识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是实践。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①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问题,就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而且主要在于改造世界。真理标准属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一个哲学问题,它主要解决人的思维、认识是否正确反映客观世界,主观与客观是否一致的问题。这里的客观世界,既包括自然,也包括社会;既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也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对于社会而言,既包括现存社会,也包括整个社会历史过程。而道德标准则不同,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精神领域,道德是一定社会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涉及的是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所以,真理标准与道德标准适用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评价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必须使用科学的、历史的真理标准,而决不能用道德标准来替代真理标准,更不能把道德标准看作是真理标准之标准,相反,真理标准作为历史的真理标准,可以作为道德标准之标准和根据。马克思在批判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施蒂纳运用道德标准来评价历史实践活动时说:对于施蒂纳而言,“共产主义简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①共产主义是通过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来逐步消灭利己主义与自我牺牲的对立。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是否是真理,它是通过实践来证明,而不是诉诸空洞的道德说教。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学派有观点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排斥道德标准。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家米勒提出,“马克思是非道德主义者”^②。马克思主义是否排斥道德标准?其实,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概排斥道德标准。马克思在对功利主义与康德的善良意志的批判中,仅仅揭示的是资产阶级道德标准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功利论无非是为资产阶级剥削辩护的理论。他说“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③。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削而言,功利论同资产阶级的剥削事实上是一致的,这是资产阶级的“真理”。但是,“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④康德的善良意志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那种软弱无力的革命要求,他把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革命活动转向于一种内在的道德意愿。马克思对功利论与康德的善良意志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客观事实,符合客观事实的“真”为正确反映,否则就是虚幻的歪曲的反映。道德标准与客观的历史事实一致,道德标准必定是“真”,否则就是“虚幻的”、“软弱无力的”。这就是说,道德标准不能替代真理标准,相反,真理标准优于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是否正确,应该以真理的标准为标准。

其次,真理标准与道德标准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1)真理标准的现实历史性与道德的现实历史标准有其一致性

真理标准是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真理标准既是现实标准又是历史标准,而道德标准离不开真理标准的现实性和历史性。马克思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⑤真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5页。

② 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1—21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